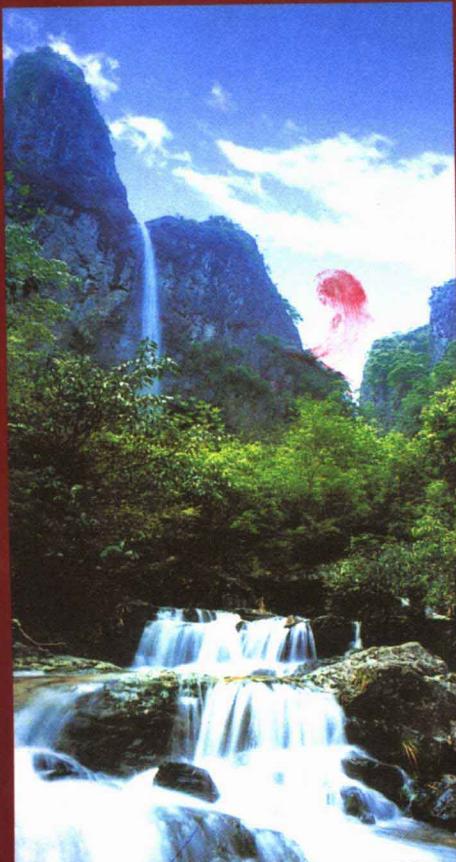


1107
三

衢

诤友

衢州市政协文史委编



〔衢州文史资料第30辑〕

三衢诤友

衢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2004年8月

衢州市政协第四届文史委

分管副主席 傅秀祥

主任 潘玉光(专职)

副主任 徐文荣 金召卫

委员 韩章训 刘国庆

陈定謇 詹 剑

刘 炯 周文钊

衢州文史资料第 30 辑

三衢诤友

责编 潘玉光

准印证(2004)第 086 号

2004 年 8 月

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

字数 238 千印数 1 - 1500 册

目 录

宋史学家叶左文	叶彦谦(1)
培桃育李的师范林科棠	林维凤(20)
衡县首位民选县长章作人记事	廖元中 章亚英 章肇谋(46)
体坛的世纪老人孙樞	方文伟(64)
冯玉祥的秘书——戈定远	刘国庆(78)
忆父亲毛家驹	毛声鸿(93)
模范教师徐菊英	方文伟(116)
周越先的卓越一生	赵春禄(136)
祝维良行商记事	愚 因(162)
琐忆戴德海	戴悦华 戴云卿(208)
姚筱轩自述	叶裕龙(224)
汪一尘先生参政议政五十年	吴美珍(266)

宋史学家叶左文

○叶彦谦



清咸丰年间，李世贤率太平军一部自赣入浙，先克常山、开化，再绕过衢州，攻陷龙游、兰溪、金华，我的曾祖父琼林（字楚良）因父其煦与爷爷焕春死于战乱，时（1861年）9岁的他跟叔父避难开化，便定居下来。

楚良先在药店做学徒，那几年生活自然很艰苦，记得祖父曾告诉我：曾祖和他的叔父两人每天早晨煮一小锅粥，分成三份，每餐两人合吃一份，仅能免于饿死而已。曾祖勤奋工作十多年后，积蓄了一些钱，又得友人帮助，自己开了一爿药店德寿堂，他又刻苦钻研岐黄之术，以后就挂牌行医了。他每天坐堂替病人看病，兼管店中的业务。他的医德很好，贫穷者往往不收医药费，对病人十分关心，有的到时候不来转方，他便找到病人家中去探访，因此深得病人的称道和信赖。他对县里的公益事业也很关心，常解囊捐助钱物，或做一些尽义务的工作，这样，他在开化县内就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和地位。

曾祖父约在1885年和比他小13岁的徐氏女子结婚（他幼年时家中已为娶兰溪祝氏女，自幼即来叶家，六岁而殇），1886年（光绪12年）我的祖父叶渭清（字左文，伯瑛）出生了，祖父幼

年天资聪慧，他四岁识字，五岁入学读书，我家在兰溪本是书香之家，曾祖迫于生计改而经商，故他锐意要让我祖父再成为读书人。他不惜化钱聘请开化大溪边的余先生来家教祖父读书。自己除医书外又买了许多经史子集各方面的古书来，祖父幼时常独自一人在这些书堆中翻阅学习。曾祖对他的管教也很严。后来我得知祖父的左耳每隔几个月就能挖出很大一块耳屎来。据他告诉我，这是幼时曾祖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留下的纪念。祖父读书可谓过目不忘，在文史方面有特殊的才能，余先生开始教他《三字经》，他父亲还未离开塾馆，而他就能背诵。余先生惊奇地称赞说：“日后必是良材。”他能高速览读，可谓“一目十行”。当时人们都称他为“神童”，而祖父没有被赞扬声所陶醉，反而更加勤奋。他常说：“学问学问，要苦学勤问。”少年时代，他除能熟背四书五经外，还博览了上万册各种史书、文集，为以后研究宋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我认为祖父的天才是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，他曾对我说过，曾祖母虽不识字，但很聪明，由前节所述，可知曾祖的智商必不低，且结婚时正在创业的高峰期，此外，曾祖父母出生在异地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这一点在旧社会的小城市中是很难见到的。譬如开化城内任何两家不是直接的亲戚就是间接的亲戚，因为每一家的儿女婚配绝大多数都是在城内或乡下找对象的。祖父九岁开始学八股文，不久即能成篇，因为他的藉贯仍写兰溪，故13岁时去兰溪应童子试，14岁补上兰溪县学生员（即考上秀才），17岁应浙江省乡试，18岁中举人，时在1903年（中间有一段时间在金华丽正书院学习），同年和开化富户林××的长女林霁云结婚，祖母比祖父大三岁，属羊，不识字，但精于女红和操持家务，当时开化城内的大族有林家、詹家和余家，但是到我幼年时林家已经衰败了，祖母的弟弟有四五人，没有一人有像样的工作能继承祖业的，詹家与我家的亲缘关系后面要谈及，余家的余

斐然曾是我的私塾老师，记得我还见过他的叔父。他的妹妹是我二祖父的妻子，他的侄子余纯光比我大几岁，曾和我的姨夫夏道彝一起在浙江地方银行工作过几年（解放前数年），那时我的高中同班同学陈惟烈（地下党员）也在该银行工作，解放后数日陈曾来浙大和我谈及。余纯光退休后一直住在杭州，现仍健在。

在那时开化县连秀才都很少见，出了一个举人可谓是破天荒的事了。因此我祖父在开化立刻成了名人，挤身于上层社会之列。他幼年时曾向往仙道，但参加科举考试之后，思想便由出世变为入世，希望将来能入翰林院，或做一名考官，到各地替国家选拔人才。他笃信孔孟之学，并且身体力行。他天性纯厚，事亲至孝，对弟妹友爱，为人谦虚谨慎，但不畏权贵，不善逢迎。在他眼里，百万富翁、达官贵人与贫苦农民，都和自己一样是“人”，应一律平等。直到我八岁时开化城内只有一条狭窄的街道，逢年过节放鞭炮时，人们常用一根长竹竿架在街道两边店家二楼的窗上，再挂上长串鞭炮燃放。当祖父在街上行走遇见对面来了一个挑毛柴的农民时，他必定避在路边让那农民先过去，绝无半点举人的臭架子。因此他那时可谓品学兼优的青年人，这在开化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多年以后就在开化树立起一块“金字招牌”，使得一般人都尊敬他，有点地位而品德不够好的人都害怕他；坏分子则恨他，想陷害他。例如：民国初年曾有人诬告他是共党分子，事实上，他那时的思想是较进步，但一辈子遵循孔孟的教导“君子群而不党”，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组织。

1904年祖父去河南开封应礼部试，落第（即未中进士），在他还未返家时，曾祖母病逝，年仅39岁，那年二祖父叶桂森（仲植）年仅7岁，我父亲叶忠（字伯敬）也是这一年出生的，是在曾祖母去世之前，还是去世之后，已不可考。后来曾祖父又娶一继室，生女名菊女，生子名熙光，熙光大我7岁。

曾祖母的死使祖父悲痛之极，他身体本来羸弱，有胃病，这

时又得咯血病，他在家居丧年余，便去金华养病，并参加孝廉堂试，得奖金以补生活费用，他有一表兄祝谦（后来是民国年间的法官），常和他以诗文唱和，有一次，他们一起参加一个有歌女侍奉的宴会，祖父即席赋诗一首以赠某歌女，此事后来被祖母所知，曾和祖父大吵了一顿。不久友人又邀他去兰溪游埠高等小学教经书，金华七中的著名国文老师曹百川可能是他那时的学生，1908年清廷特开举贡试，即把考进士落第的举人分配工作，祖父的材料被送往吏部，后分得盐运库使，随即去广东任职。他工作之余好学不倦，特去两广方言学堂拜监督（校长）陈黻宸（字介石，温州人，历史学家）为师，并得识陈的学生马叙伦。（马叙伦（1885—1970），字彝初，浙江余杭，曾任北大教授，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，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长，高等教育部长，长于书法和诗词，对音韻学、训诂学有研究，著有“石屋餘津”，“石屋續津”等）。陈、马师生对满清政府极为不满，后来都参加辛亥革命运动。祖父与陈、马交游，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。不久，祖父又去潮州盐田局工作，南方卑湿，潮州尤甚，他下痢几死，痢止又苦神经衰弱，不能阅读，故遂决定辞去盐运使官职，于1910年回到杭州。归途有一义乌（东阳）人×××同路，那人贫病交加，得祖父的帮助很多。北伐军占领浙江后，各县曾试行民选县长制，此人曾极力推荐祖父去该县做县长，当然他是不会去的。

他到杭州后又去浙江咨议局看望陈介石老师，陈留他在杭暂代议事科书记（解放前清政府及国民政府的“书记”就是“记录员”，与现在的“书记”完全不一样），但因议会已开过了，他无所事事，岁末辞归，这期间陈先生又介绍他和马一浮先生相识，马一浮（1883—1967），别号湛翁，蠋叟，15岁应绍兴县试，名列榜首，同时考试的还有鲁迅、周作人等，16岁娶妻汤孝愍，19岁妻死，遂不复娶，20—21岁游学美、欧、日本诸国，通晓多种外文，

最早将马克斯的资本论带回中国，回国后潜心研究西学、佛学及中国哲学，以卖字为生，1938 年在浙大（泰和、宜山）讲学，1939 年在四川乐山任复性书院院长，讲孔孟之学并刻书。1947 年废置复性书院，1953 年起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，1950 年起住西湖蒋庄。马先生绝顶聪明，学问渊博，犹胜过祖父一筹，祖父要拜他为师，马因只比他大三岁，又了解到他过去的情况，不允，许以兄弟相称。他们的友谊随着年月的增加而不断增进，直到老死，常言“文人相轻”，这句话对祖父和两位马先生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。

次年议会开始，陈先生又电邀祖父去杭任书记，他没有去，民国成立之后，祖父病稍愈，因曾祖身体日渐衰老，1912—1920 这九年他就在开化家居，主要是服侍曾祖父。但 1913 年他曾去杭州马一浮先生处住了三个月，两人每天研读各种版本的论语数页，并且进行细致的讨论（见马一浮全集，卷三中第 19 页的诗），自 1928 年 2 月起祖父应詹咸熙（时任开化县立天香小学校长，1924 年任县教育局长）之聘，任开化鍾峰高等小学国文教员共一年半。该校自 1919 年 8 月起改称开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，祖父的月薪仅为 20 元，当时学生中成绩优异的有吴光韶、张育夫、王扶生等人，后来吴、张都去外地工作担任国民政府的官吏，王则任大学教授，但祖父与他们几乎没有来往，只是当他们回里探亲时顺便来看看祖父而已，其他学生我知道的还有余斐然、夏秉谦、黄冠金、周贞木等都在开化工作。

祖父在开化除了服侍曾祖和教书以外，又开始编辑“开化丛书”，因为开化自宋至清八百余年中，闻名的学者就有程俱、张道洽、戴敦元等十多人，他们都有著作流传下来，祖父认为应当把那些还能找到的著作收集在一起，“网罗一邑文献编为丛书。”他首先编成的是宋张道洽的“梅花诗”。张曾写过三百首梅花诗，但大多散失。

1918年，祖父从元朝方回的《瀛奎律髓》中集得三十六首律诗，1918年把它编印出版，并写了一篇〈识〉：

“张泽民先生梅花诗三十六首，余从《瀛奎律髓》中抄出。求其全集卒不可得。往，余欲编开化先哲遗著，甄采寡获，此愿久虚。更数百年，当有倍难于今日者。开化在宋有程俱致道、张道洽泽民、张汝勤贤夫、徐子荣秋涧、吾衍子行；元有郑介夫以居、张宗元仲亨、鲁贞起元；明有金实用诚、徐兰与善、徐曦叔霁、吾绅叔缙、吾冔景端、吾谨惟可、徐文溥可大、方豪思道；清有方易梦觉、戴敦元吉旋。此数公者，咸负大名，有撰述。今其文字千不存一。近代若张立本、汪文元，皆阮文达诂经精舍中高第弟子。余仅见其说经之文二篇，邑人则或不知其姓字。吾侪平居每以不朽自待，成就如数公庶亦可矣。而传之之难乃尔，然则人欲求不朽者其果安从也？

吾开化地不当孔道，兵戈水火又不刷于他邑。猥以不甚爱惜之故，前人著作日用湮没，其祸乃更烈于兵戈水火。而通都大邑多贤士大夫，手抄板摹，一编万本。若预知有兵戈水火而防之，故兵戈水火卒不能以困也。事有似缓而急者，开化丛书之编异时终不可以已。今但存此数字版心以示本志，吾尝独居深念，人一日不饮食则饥渴。至一日不读书则鄙吝生。鄙吝害心，饥渴害身。除身害不除心害，宁得为知类乎？古人已死不可作。吾取其书而读之，其会心处亦复不灭。晤对三十六诗，虽非其全，老辈风流正自不浅。排印相饷，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？

可见他对古代文物的重视，对任意糟蹋前贤遗著的劣行的愤恨了。在《附识》中，郑县长对叶编辑丛书事大加赞赏，希望他能“毕其所志”。以后，他又写了程俱年谱，这项工作后来因为曾祖病，以及曾祖死后我家的生活困难，他得去外地谋生等原因而未能继续下去。

自1917年起曾祖父病情加重，主要是气喘，盗汗；入夜二更

以后更甚，每晚祖父和他的继母一坐床下，一坐床上，服侍曾祖直到四更祖父才退出。稍事休息，上午还得去学校上课，待曾祖病危时，祖父竟仿效古人割股疗亲的故事，在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，加入药汤中一起煮后，喂曾祖吃那有肉汤的水药。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。1919年初曾祖父病歿，享年67岁，至1920年3月出葬，开化城内老百姓送葬者特多，他们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而惋惜不已。

这时马一浮先生已是祖父的挚友，他专程从杭州到开化来吊孝。我父亲已16岁了，祖父平时对他管教很严（可能有点过份，如解放后在衢时，一次，祖父大怒，吾父竟跪下请罪，一段时间，父亲常在夜间叫喊、捶胸），父亲幼时没有进小学，只在家中由祖父教他读文史和医书，他的天资也很好。马一浮离去时把父亲带到杭州医治疥疮，父亲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去杭州著名中医师陆辅平那里学医，祖父亦于1920年底去杭州谋事。早在1919年马先生已来函邀祖父去杭州为他的妻兄汤孝信（拙存）教育其子侄、1920年4、6、12月又三次来函邀请他去，所以这次他就在汤家做了几个月的家庭教师，马先生的岳父是汤寿潜（清末浙江都督，民国初任交通部长），汤孝信那时开一光华火柴厂，是浙江省最早的火柴厂，他的儿子汤彦森就是祖父的学生之一。

在料理了曾祖父的丧事以后，我家就一分为三，祖父把药店分给他的二弟叶仲植（二祖父学医多年，一直经营德寿堂，长子叶信、次子叶诚）去经营，把家中的全部田产都分给他的继母（生有一子一女），而自己所剩的只有几间住房和我祖母的少量陪嫁田产，再加上我母亲的陪嫁田产，每年租谷收入约有两千斤光景。药店第一年还给我家一百元，后来我家就只能在需要时从店里免费取药而已，祖母的几亩田我家都是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的，所得的租谷还不够吃饭，再加上祖父每月20元钱薪水，一家

人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。1924—1926三年中，祖父家居没有工作，父亲学医未卒业，汤考结先生每月汇100元来支援我们，甚为可感。1921年2月至4月，马叙伦聘请祖父去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图书室指导员，月薪35元，8月至9月转浙江公立图书馆任编纂，月薪50元，同年9月马叙伦去北京任教育部副部长，遂聘祖父去北京任京师图书馆主任，月薪150元，他只做了两个月，就辞去主任这职，改任馆员，做编辑校订方面的工作，月薪80元，但那时国民政府常常欠薪，发不出钱，所以我家经济仍是困难，祖父工作之余便是读书，别无其他嗜好，京剧他也很少去看，马叙伦在“石屋徐津”中对他很是称赞，1923年秋马叙伦离开教育部，同年十一月祖父也离开北京回家。

1922年父亲18岁，在杭州和我母亲饶梅仙结婚，她比父亲大了五岁，在这以前父亲曾和开化詹家詹荣甲之妹×××订婚，但后来她病死了，所以我叫詹荣甲兄弟们“舅舅”，荣甲是外科医生，后任开阳镇镇长，二弟荣许开店“詹华昌”，三弟荣鼎是小学教师，四弟荣兴无业，五弟荣顺后来随我父学中医，最小的妹妹九媛，嫁给广东人，我母亲是饶孟奎的长女，开化环碧坞人。1910年外祖父在开化积极参与禁烟运动。后到杭州开“治记木行”。1929年，开化大旱次年粮荒，他以木行抵押，自沪买洋米五千石运回家乡平粜，又最先剪辫，不让女儿缠足，提倡女子读书。我母十余岁就随外祖父去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纺织科读书，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是同班同学，她同班的好友还有一个叫胡佩芬（其夫连瑞琦是医生）的，在解放前后仍住杭州。1952年我在浙大工作时，母亲曾来杭小住，我还陪她去看过胡佩芬以及她过去的老师谢先生（女，已学佛了）。母亲毕业后本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，进一步深造，但因婚事而放弃了这个机会，很可惜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她去了法国，那末我和弟妹以及我们的子女将一个都不存在了。她婚后在开化办了一个织

布厂，每年也能织出不少布来。从 1923 到 1930 的 8 年中她共计生了四了孩子，我出生于 1923 年 11 月（旧历为 9 月），大妹嗣徽比我小两岁，大弟彦复比我小 5 岁，二弟彦恒比我小 7 岁，在开化时她主要忙于布厂的事，孩子请奶妈来家带着，祖父和父亲在外地的时间较多，家中一切家务全由祖母操劳。

父亲婚后因陆辅平先生病逝，祖父曾想要他去读杭州的中医学校（抗战前衢州的名医祝蔚文就是该校毕业的，他比父亲大两岁），但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去嘉善从吴文泳医师学习，以后又去上海从名医王仲奇学习，估计后二人仍是马一浮先生介绍，而经济上是得外祖父资助的（以上事实可参见马一浮集，卷 II，P435 – 436 中所载马先生给祖父的信），他学成后（1927）便在杭州开业，诊所在清河坊西，官巷口西南的惠民巷内，又从马一浮 II 427 – 448 页所录马先生给祖父的 14 封信（1915 – 1922, 1937 – 1941）中可以看出他们讨论学术问题很认真，很深刻；批评很尖锐，不讲情面，但大家都很谦虚，各自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，有不同意见，可以保留，且不伤感情，须知他们讨论的不是数学物理问题，而是哲学，文史方面的问题，它必然牵涉到人生观，伦理道德等方面，能做到如上所说的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1928 年年底，马叙伦当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政务次长，硬把祖父拉去帮忙。次年 4 月，马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，又请祖父赴北平任该馆编纂部主任，并代他处理日常馆务。同年 6 月，北海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合并，成立了“北平图书馆”（即今“北京图书馆”前身）。上面派蔡元培当馆长，派前北海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。原馆长马叙伦于 8 月份辞职，祖父则到 1930 年年底离馆，全力从事《宋史》校订的资料准备工作。

1933 年 1 月，祖父再度受北平图书馆之聘，担任《宋会要》的编印委员。同时应聘的还有傅源叔（增湘）、陈援庵、章武之、余森玉等著名专家学者。这部清人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材

料，大多为《宋史》所未载。经他们几年的校订，到 1935 年秋终于编成付梓。当年哈佛大学、燕京大学认为此举“关系宋史学之研究至钜，特补助美金 2500 元为印资”，于是这 200 册的宏篇巨著才得以影印出来，为国内外学者专家进一步研究宋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丰富的资料。

《宋会要辑稿》刚刚校订完成，“冀察事变”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兵临城下，华北形势紧张，平津一带开始疏散。祖父因此束装南下，回到衢州，同我们一家人住在一起。这时我家已从开化迁居衢州约二三年，我已上初中一年级了。祖父在衢州继续做《宋史》的校订工作，还编定邵康节、陆放翁等人的年谱数种。

1941 年 4 月 15 日，日机九架对开化狂轰滥炸，第一颗燃烧弹竟落在“德寿堂”祖父的书房上，顿时烈冲天，一片火海。祖父的全部手稿、几十年来的日记，以及所有藏书和往来书信，统统在顷刻之间化为灰烬！祖父事后向人诉说：当时他面对火海，耳接轰隆劈啪之声，真是五内俱焚，不知所以。他一向以为“不当孔道”的开化是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怎知道连这个偏僻山城也不能摆脱日寇灭绝人性的浩劫！

祖父虽是前清举人，但他并无意于功名利禄，至少在进入北京图书馆以后，他已决定把自己的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了。他告诉我，自己对历史学的兴趣是从听了陈黻宸先生讲中国史以后开始的，陈先生讲历史有他自己的观点，非常动听。祖父在北京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校勘全部《宋会要》，前已提及这是一部数百卷的有关宋代历史的重要著作，校毕刊印时，书的最后有他写的校勘记。由于这一工作，以后他的研究方向基本上就集中于宋代历史了。

从 1935 年到 1937 年的两年多，是我和祖父朝夕相处的年代，因为那时我父亲在衢州行医已有一点名气，父亲一人的收入足够我们一家八九口人的衣食，因此祖父得以家居专心从事宋

史的研究工作，暂时不用再为生活而奔波了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，我家又迁回开化，我一人在衢州石梁镇读衢州高中（第一班，抗战前衢中只有初中部）。

祖父在衢州的三年中经常和他交往的有徐映璞（著有九华山志，孔氏南宗考略等书）和陈伯治（福建人，当时是法院检察官，好古文）；他与林科先生也有来往。

我还隐约记得，四五岁的时候，祖父常抱我坐在他膝上读诗，这些诗都是他从诗经、唐诗中选抄出来的名篇。但他从来不教我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之类，当时私塾中典型的启蒙读物。祖父对我父亲的要求极为严格，要求生活严谨，待人以“礼”，要谦虚好学，还要特别注重医德的培养。祖父对我和弟妹在品德和学业上的成长也十分关注。他不懂英文、数学但对语文、历史、地理等作业他都要仔细检查，还要看我们每天写的日记。有时他和我上街，看到从前教过我的小学老师，我不曾主动叫老师，就当着老师的面批评我。即使在暑假期间，我们每天至少也得做半天的功课，他看见我夏天要午睡，总是摇头。因为尽管他每晚工作到一二点钟，早晨也起得不算迟，但他是从来不午睡的。我们每天放学回家，夜间如果完成学校作业后还有时间的话，他就给我们上一篇国语，战国策、史记或汉书上的文章（四书和诗经，书经我早在九岁上小学以前的私塾中念过），但他也鼓励我们看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名人传记和文学作品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我进衢州高中，学校为避敌机轰炸，迁往乡下，我家不久也迁回开化，只留我父亲一人在衢州行医以维持生活。我只能在寒暑假回家时才能生活在祖父身边了。1937—1940年我在衢州乡下念高中，祖父就让我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带往乡下去作为我的长期课外读物。虽然他很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学历史，以继承他的事业，并曾多次对我说过，我国的著名学者有不少都是家传数代的，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伟大的著作。但后来发现我

对数学更有兴趣时，也就不再勉强我去报考大学历史系，却希望我将来对他想要完成的《宋史注》的历律志部分给以协助。

记得在1937年冬马一浮先生带着服侍他的汤小组（内侄女）及外甥丁安期、还有他的学生王星贤一家人，由杭州避日寇到开化暂寄寓在我们的亲戚家。不到两个月，马先生受浙江大学之聘去江西泰和任特约讲座。1938年初，马一浮到重庆复性书院主讲“孔学”。祖父在自己的书桌旁贴有“《经》吾师会稽马一浮，《史》吾师瑞安陈介石……”等字样，足见他对马的尊崇。但当马邀他同往复性书院讲学时，他却婉辞了。抗战中期，国民党当局命令全国公教人员诵读《礼运大同》《张载西铭》《曾国藩复贺偶耕书》三篇古文，企图借此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的“渗透”。事前南京政府曾指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聘请祖父为三文作诠释，却遭到断然拒绝。从这里可以看到祖父那种“我行我素、不求闻达”的铮铮铁骨气质和他对待蒋家王朝的态度了。

1940年秋我高中毕业后去龙泉浙大分校读书。前已提及1941年初夏我家开化的住宅中了两枚日寇燃烧弹，衣物全毁，书籍亦所剩无几，仅一家人幸免于难，后遂寄居开化乡下亲戚家。我于1942年秋随同学们辗转奔赴贵州湄潭继续求学，毕业后留数学系任助教，直到1946年夏才回开化。在这六年中，我父亲在衢州行医的收入大减，因此一家人在开化的生活是很艰苦的，祖父重操旧业在开化县中教书，闲时在家教我大妹嗣徽读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内科典籍，1945年大妹得伤寒病，因缺医少药而不治死去，祖父悲痛万分。

抗战胜利，祖父欣喜若狂。那时他在县中里兼课，在庆祝胜利后第一个元旦时，他和一位年青教师吾宗彭合作写了两副对联贴在学校的大礼堂中。

其一：“浩浩神州，鸡唱千门除旧岁；
桓桓多士，春阳万里颂新年！”

据说，对联中的“旧岁”是指胜利前山河破碎的年月，而“新年”则是比喻胜利后金瓯无缺的新时期。

又一副是校长的《百字联》，只记得其中有“藩接箕壤，土拓辽疆，水淹台澎，陆通缅越”数语。可以说是他们对祖国光荣历史的颂扬，对我祖国未来繁荣富强的憧憬。

1946年初冬，开化夏川人、中共地下党员郑士魁脱离了国民党的中央航空学校，突然返回故乡。故乡中年以上的人和反动当局不会忘记八年前他曾因言论激烈，被县党部目为C.P.分子，而不得不出亡这一段历史。因此卷土重来的神秘人物，一时竟无立身之所。祖父对郑的这一段历史不仅早有所闻，还很欣赏他这种“为桑梓服务”的精神。祖父到处为他说项，终于使他于次年当上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和简师附小主任。郑从此得以在正当社会职业的掩护下，同邹鼎山、鲍云鹤等同志在一起，为革命做了一系列有益的工作。

1944年，开化首创初级中学，校址设在包山的背面，原崇化书院旧址。祖父为了桑梓教育，办学育人，谢绝几所大学的聘请，跋涉前来山区初中担任国文教员。他仰望校园里两棵苍劲挺拔的古樟，作《题吟包山古樟》七绝。

豫樟树自宋仁皇，
善守风流百代长。
树木树人同一意，
包山黉舍又重光。

他热爱学生，教育尽心。如一位年轻教师，教学倒挺认真，就是态度粗暴，动辄体罚学生，结果引起学生罢课斗争。事隔数日后，校长召开校务会议研究开除为首肇事者，并给各班参与闹事的同学一律记过处分。祖父知道了，连忙赶到会议室，愤愤地说：“教育为人师表，教师有错不查，有错不纠，反而处理受害的学生，我辞聘！”与会者面面相觑，不欢而散。